

·名人手札·

况周颐和暖红室《汇刻传剧》
——读《况周颐致刘世珩手札二十三通》

吴 书 荫

清末民初不少官僚出于兴趣和爱好,或者为了附庸风雅,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,喜欢编书刻书,特别是当他们罢职闲居后,更是全力以赴,乐此不疲。刘世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,他刊印了《聚学轩丛书》三集和五集、《贵池先哲遗书》三十一一种并附待访书目二百七十二种、《玉海堂景刊宋元刊本丛书》二十二种、《宜春堂景宋元巾箱本》八种等。对古代典籍和乡邦文献的保存、整理和传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在他所刊印的诸多古籍中,以暖红室《汇刻传奇》为治曲者所乐道,其单行初刊本也被藏书家所珍藏。

刘世珩(1874—1926),字聚卿,一字葱石,号继庵、枕雷、楚园、梦凤等,安徽贵池人。父亲瑞芬为广东巡抚,移家江宁。光绪二十年甲午(1894),世珩举江南乡试。二十七年,以道员指分湖北,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赏识,调回江苏,与张謇共同主持江南商务局。二十九年,派赴日本考察。归国后,办实业、报馆、书局,后官至左参议^①。他对戏曲情有独钟,但对前人编印的戏曲集又多有微词:“传奇杂剧向无汇为一集者,明臧晋叔《元人百种曲》雕镂甚工,颇有删节;《盛明杂剧》录只四折;汲古阁刻《六十种曲》虽是完书,又无画像,终非佳本。”他所看重的戏曲刊本,是乾隆五十年乙巳(1785)印的冰丝馆《还魂记》,认为“校讎既精,版式亦雅,其图以明本重樵,

尤极工致，可为传奇刻本之冠。”（《汇刻传奇自序》）其实，冰丝馆本并不是《牡丹亭》的善本，它是乾隆间在扬州设局修改曲剧时，叶堂和王文治合搞的一个进呈本^②。为了避清代的忌讳，他们对剧中凡是涉及南宋和金朝的内容作了大量的删节，故郑振铎先生说：“自冰丝馆刊本《还魂记》出，而《还魂记》遂无全本矣。”（《劫中读书续记》）由于要呈送乾隆弘历过目，所以在刊刻方面特别考究，刘世珩欲以之为刻本的样板，想编刊一部令自己满意的《汇刻传剧》。

从光绪二十六庚子（1900）起，刘世珩就开始这项工作，故他在《汇刻传奇自序》中说：“庚子、辛丑间，余刻《董西厢》，于是有《汇刻传奇》之举。”至宣统二年，所刻《小忽雷传奇》刚竣工，就已经“搜集元以来传奇三十种，汇刻行世”（《小忽雷传奇跋》）。当初是以单种陆续刊行，这些早期的刻本如今已经凤毛麟角，究竟刊印了哪三十种？除了少数几种外，其他的难以寻觅了。辛亥革命后，刘世珩逃离武昌，避居上海，筑楚园，做起寓公。他有钱有闲，除了徜徉于金石书画外，便全力以赴，实现他未了的刊印古籍的心愿。

《汇刻传剧》，即《汇刻传奇杂剧》，又称《暖红室汇刻传奇》，为了将这套丛书继续编印下去，并力争做到刊印精良，刘世珩曾经穷搜博访，网罗善本佳刻，凡有绣像插图者，皆由室人傅春嫻摹绘；无者补画，董其事者都是当时的画坛高手。校勘之事除自己和两位室人（另一位是继室傅春嫻）承担外，还聘请当时的词曲名家参与其事，“复勘者临桂况舍人夔生周颐、嘉善陈太守仲周维祺、嘉兴刘邮部凤叔富樑、长洲吴明经彙安梅”（《汇刻传奇自序》）。还有一位李详审言没有列名，他曾在楚园校过《聚学轩丛书》，后来也参加了《桃花扇》的校勘。在这些校曲者中，以吴梅出力最多，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，并且写下许多跋语，可以说是校勘《汇刻传剧》的功臣。刘富樑是由吴梅推荐的，他主要参与订正曲谱，这从吴梅所撰的《燕子笺跋》中，我们可以略知一二：“是时刘君葱石方欲汇订《四梦》、石巢、石渠诸曲谱，邀凤叔主其事，余因得与之上议

也。今葱石既逝,此记全谱未知是否付梓?”^③据傅惜华《元代杂剧全目》著录,刘富樛所订的《双忽雷阁汇订全本曲谱第一种西厢记》,已由刘世珩赐书台写样待刻,由于刘氏辞世而未能刊印,后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收藏。其他几种曲谱的命运则不得而知。关于况周颐的情况,我们仅知道,他为《汇刻传剧》写了一篇骈文长序和三首题词,刊于该丛书的卷首,究竟参加那些校勘工作,他从来就没有透露过,也不见他人的记载。所附第四封信中有这么几句话:“目前贱状,只缘此一线生机,务求代秘勿宣,庶几可望有成。”很值得思索,何事需要“代秘勿宣”严守保密呢?因为写得比较含蓄,我想很可能是校曲之事,请刘世珩不要为外人道也,故而有关校曲的情况一直隐而不露。至于陈维祺的情况,更是一概不知。

我们在编辑《绥中吴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》时,从《暖红室校刻传剧资料丛辑》中^④,发现况周颐的一批信札手稿,总计二十三件,其中写给刘世珩的二十二封(其中两函内容相同,措辞略微不一样),另有一函无收信人名号,落款为“后学周颐叩复”,况氏既称自己为“后学”,信当写给一位前辈;还有一篇署名瓠庐写于甲午(1954)季夏的“附识”。这批手札装在一个特制印有阴文“仲可引玉”的大信函内,封皮上书写:“内要件外书七本,刘大人启,况臧。”当系况氏亲笔手书。它们如何流落到吴晓铃先生之手?不得而知,只能等待知情人解读了。况周颐的手札从不见刊布,因此,这批信札也就显得特别珍贵,它们不仅披露了况周颐晚年襄助暖红室校勘传剧的情况,而且还揭示了他穷愁潦倒、晚景凄凉的境遇,使尘封已久的历史信息得以公诸于世。我已点校整理,作为此文的附录,供研究者参考。

况周颐(1859—1926),原名周仪,因避宣统溥仪讳,更名周颐,字夔生,号蕙风,又号玉梅词人,广西临桂(今桂林)人。光绪五年举人,官内阁中书、会典馆绘图处纂修、候补知府等。宣统三年九月,他由大通樵运局闻警来沪^⑤。自此赁屋闲居,颜其室为“餐樱庑”,他

的晚年基本在上海度过。清末王鹏运、朱祖谋、郑文焯等，受到乾嘉学派校订经史的影响，将校讎学引向对词集的校勘董理，而况周颐则对校勘工作不感兴趣，即使自己喜爱的词也不例外，“余癖词垂五十年，唯校词绝少”，他认为校词有误于读词：“盖心为校役，订疑思误，丁一确二之不暇，恐读词之乐不可得，即作词之机亦滞矣。”^⑥他既然不喜校词，又何以会应聘校曲呢？一是，他曾在刘世珩开办的江楚编译书局供过职，来到沪上以后，又常杯酒往还，他磨不开朋友的情面。二是，他当时经济状况非常困窘，专靠卖文或者替人捉刀为生，连房租都难以支付。在他看来校曲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方式卖文，每校一页可获得二分银子的报酬，再加上其他润笔费，至少可以暂时缓解生活上的压力。这样，况周颐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初衷，应邀参与校曲以及其他古籍的整理工作。当然，也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，他自知光靠卖文校曲，也非常久之计，“唯贱状无一长局之事，似此零沽叫卖，何以为怀”（见第十九封信），因此，他希望通过校曲，以取得刘世珩对自己的“关垂”，仰仗他向中华书局经理陆费逵介绍和推荐，好去谋一份牢靠的工作。可见校曲对这位一代词学大家来说，实属于一种无奈。

况周颐写给刘世珩的手札，都是一些私人便笺，没有具体的纪年，只签署“即刻”、“即午”、某日，或者某月某日。他们虽身在民国，但都是清朝遗老，仍眷恋清室，不愿署民国纪年而用干支，或仍继续用宣统的年号。无疑给考查校曲带来一定困难。但况氏所撰《汇刻传剧序》，署“上元第三甲寅三秋九月重阳前五日”，“甲寅”即民国三年（1914），可以确定他参与校曲在1914年之前。所附第十九封信说：“《紫钗记跋》拟今夕属稿。”这篇《紫钗记跋》是他为刘世珩所代笔，跋后署“宣统甲寅长至日”。宣统无“甲寅”纪年，此“甲寅”也为民国三年，而“长至”一般指夏至。此信无年月，仅署“初十”，但信中有“《金石文》如能销售，则度岁之资可无须奔走筹策”这样两句话，既然为“度岁之资”而筹划，信当写于年终的十二月。那么，

《紫钗记跋》只能写于民国二年年终，此记刊印时，才将跋语改署“宣统甲寅长至日”，即1914年夏。因此，况周颐襄助暖红室校曲，应从1913开始，至1914年九月重阳节前，具体说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。

况周颐虽然对校书兴趣不大，但只要应允了朋友，就非常认真投入，他向刘世珩表示：“先生委办之事，当必精益求精，速而又速也。”（见第七封信）的确也是如此，而且很快就校订了下列曲本、曲目、曲谱以及《西厢记》的附录，如：

《会真杂录》上卷一百四叶、下卷三十叶，《江东白苎》全部、《录鬼簿》全册、《昆腔正律》前四卷三种共一百七十六叶，《传奇序》、《西厢目》十七叶，《琵琶记》眉批全部十六叶，《钱塘梦》，《牡丹亭》一百十三叶，《芙蓉亭》，《紫钗记》上卷、下卷九十二叶，《南柯记》，《绿牡丹》上卷五十叶，《秣陵春》一百七十七叶，《桃花扇》，《荆钗记》六十八叶。

况氏校勘的戏曲可能还不只这些，“陈眉公《西厢音释》、顾玄纬《会真杂录》及《西厢考据题释》交去写样，必有底本，未蒙交下。各底本祈即交下，否则无从校也”（见第七封信），这三种或也为他所校，或用它们参校别书。同信又云：“《紫钗》、《邯郸》两跋如何作法，祈书节略各一示下，即可属稿。”看来，他还校过《邯郸记》，否则不会主动提出作跋。从他每次校毕归还的书目中，尚有《杀狗记》等未计算在内，可能他也校过此剧。

况氏还校过《大戴礼记》、《传灯录》七卷。

不管是初校和复勘，还是写样上版时的校对，他都非常认真细致，如《荆钗记》虽经别人校过，他还是放心不下，又补校出“十之八九”。又如“《录鬼簿》新写本，著录曲名全然倒乱；原书次第，所有小注全行删去。……各小注及题识长跋总不应删削耳。此本讹字均已校出，即依此改正付雕亦可。”他对这种不尊重底本、任意删削的做法非常不满。再如“《荆钗记》之两‘介’字，再细思之，以仍之为

是。上‘介’字是递书与吏目，下‘介’字是递书与钱关目。或于书眉加一批云：两‘介’字并应作‘递书介’，不言递书，省文耳。恐曲本科白中，它处亦有如此令人意会者，故以不改批出为宜”。他字斟句酌，对《荆钗记》中的两“介”字，仔细思考，仍以保留为是。他担心再引起疑问或费解，提出用校勘记的方式注明，“以不改批出为宜”。

民国初年《汇刻传剧》刊印时，友人吴鸣骥为该书《题词》，其四云：“传奇五十种分明，荟蕞三朝绝妙文。扇底桃花无限恨，多情好事却输君。”^⑦第三句下注曰：“《汇刻传剧》以《桃花扇》终，先生别有怀抱。”的确如此，刘世珩作为清朝的遗老，念念不忘已经覆灭的清王朝，他煞费苦心，藉校刻《桃花扇》以寄托他的哀愁和眷恋。因此，在校勘和刻印上倾注了大量心血。暖红室校刻《桃花扇》有两种，一种是《汇刻传剧第二十三种》，此本以西园本和兰雪堂本校刻，刘氏的跋语署“上元甲寅月当头夕枕雷道士识于海上楚园”，应刊于1914年。况周颐曾参与这一次的校印工作，他在信中两次提到校《桃花扇》事，一次是在病中，“勉强能在床坐起”，“再能稍久坐即校《桃花扇》”（见第十五封信），此信写于十八日；还有一次是二十四日，信云：

《桃花扇》校刻绝精，可为《汇刻传奇》之冠。此次更精校，校出元误，有至佳至快处。唯所欠之叶，送样内欠数叶，必须送校，凡加朱之处，必须照改，勿讹勿漏。如能一依朱笔，则一〇一亦无舛误。改后必须打小样送看，庶几完善。（见第十六封信）

况周颐也是以遗老终其身的，他对暖红室主的用意一定能心领神会，因此校勘《桃花扇》当然格外尽心，对刊印前的最后工序，反复叮嘱，严格把关，庶几使其更加完善。

即使这样还不能使刘世珩逞心如愿，第二年又重校了另一种《桃花扇》，即《汇刻传剧第三十种》，由吴梅、李详负责校订工作，并参校了叶起元的序刻本，书名改题为《增图校正桃花扇》，吴梅的

《校正识》署“乙卯季冬”，“乙卯”为1915年，而李详《校定本跋》，则写于1916年三月，当刊行于这一年。李跋云：“于此尤不憚一刻再刻，成为定本。”

照说经过两次校刻，况且后一次又有顾曲名家吴梅参与其事，应当是精益求精了，为什么民国初年印行《汇刻传剧》时，《桃花扇》只有目而无书呢？过去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最近，我又读到一本民国十二年暖红室校刻的《桃花扇》，原为傅惜华藏书，今归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。此本是在1916年校本的基础上重刻的，吴梅的《校正识》、李详的《校订本跋》均被置于卷尾。新增了刘世珩写于1923年三月的跋语，今照录于后，以飨读者：

此本一再校写改刻，精益求精，数年于兹，今春方断手。所谓头白易，杀青难也。张三让同岁，题跋于客冬始寄到，时余从京师贺今上大婚庆典归来。卧病三越月，昨甫病起。料量书稿，亟以跋语付写，并以原札附后，存其真也。让翁此跋发前人所未发，直为此传考订编年，而余依年接续刻之，恐与前之诸跋，有失纪年次第，非敢后也。宣统癸亥三月三十日。

“数年于兹，今春方断手”，所以他感慨系之，“头白易，杀青难也”。除了刘跋外，新增了张三让的两篇跋语。张三让即张美翊，刘世珩早就请他为《桃花扇》写跋，一诺十年，终于在“壬戌（1923年）十一月”接连寄来两跋，其中一跋云：“因念云亭、瑶星为此书眉目，并考其身世。词笔冗琐，乃得千余言，靦颜录呈斧正。”世珩称其考证“发前人所未发”。

《桃花扇》至此已经三刻了，应该说可以了却他的心愿吧。但并非如此，刘氏又以此本为底本重新加以校订，该书卷下的书衣上，有墨笔题写的校刻手记，如“修改过了”、“补字写就粘上”、“十、九号已另写成，重刻因加字推行”等；书眉多有“加线”（行界线）、“加点”（圈点）及批改字样，全书挖补处也不少，甚至还保留有当时的浮签；叶起元的跋后有七行空格，刘世珩亲笔补写了一篇题识。显

然这是一部修订后待刻本《桃花扇》。原来他对《桃花扇》一次又一次的校订，所以才没有收入《汇刻传剧》去。我过去心存的疑团这才得以解开。不久，刘氏就离开人世，这部写样待刻本未能刊行；而整个《汇刻传剧》也只汇刻了传剧十六种，附录十三种，附刊三种，别行一种，共三十三种，尚缺十八种，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。

况周颐不仅参与校勘传剧，而且还替刘世珩捉刀，为《紫钗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邯郸记》、《昆腔正律》、《江东白苎》诸书撰写了跋语。凡撰重要传剧的题跋，他都要先至刘府，“晤教片刻，面聆意旨”，因“先聆意旨，作成易合尊意，免再改定”；或者请刘氏写出该书的“节略”示下，方可属稿。这与其说尊重对方的意见，不如说受雇于人，需要仰人鼻息，缺少主动权，这从他凡事皆要向刘请示，也可以看出来。当然，如果从另方面来考量，也反映了暖红室主对《汇刻传剧》编纂和刊印的严格要求，以保证这套丛书的高质量。在信中还透露出新的情况：“传奇提要，亦拟十日内报命。”（见第九封信）又云：“则年内所能报命者，容不止传奇提要而已”（见第十九封信），看来他不仅仅写了跋语，还为传剧撰写过提要。刘世珩在《汇刻传剧自序》中说：“编列总目，各撰提要。”“总目”今存，而“提要”却不见踪影。况氏究竟撰写过哪些“提要”，信中没有具体说明，也就难以考察了。

对况周颐校曲如何评价？这批手札从刘世珩后人那里散出后，1954年季夏，曾被瓠庐先生过目，他睹物怀人，一往情深，即挥毫写下一篇“附识”，今存于信札后。他认为：“况公为清季词人之杰出者，向使最随半塘、四印、疆邨一编，而参与校词，成业不可限量。”因为词曲韵律不同，且多代语和方言，词人“乃从事校曲，遂至颠倒串戏，折拗嗓子，我人姑卑之无高论。”显然对况氏参与校曲很不以为然。瓠庐先生为况氏鸣不平令人感佩，但他对其校曲的看法，实不敢苟同。曲由词出，它们有相通之处，但曲又迥异于词，这是起码的常识，作为清季词学大家的况周颐岂能不知？他喜好戏曲，与梅

兰芳有过交往，1920年梅兰芳赴沪演出时，他一气写了二十一首【清平乐】，题《香南雅集图》^⑧，这虽然是校曲以后的事，说明他对戏曲并非门外汉。他也曾多次在《餐樱庖词话》中谈到词曲的特点。如：

元人制曲，几于每句皆有衬字，取其能达剧中之意，而付之歌喉，又抑扬顿挫，恍人听闻，所谓迟其声以媚之也。

又如：

两宋人填词，往往用唐人诗句，金元人制曲，往往用宋人词句。尤多排演词事为曲，关汉卿、王实甫《西厢记》，出于赵德麟《商调蝶恋花》。其尤著者，检《曲录》杂剧部，有陶秀实《醉写风光好》、晏叔原《风月鹧鸪天》……等出，皆词事也。就一出事而审谛之，填词者之用笔用字何若，制曲者又何若。曲由词出，其渊源在是；曲与词分，其径涂亦在是。曲与词体格迥殊，而能得其益，皆佳妙之故，则于用笔用字之法，思过半矣。

他对曲中衬字的作用，曲与词的相互关系，以及它们体格的迥殊，都说得非常中肯。他也留心曲中的方言，校订《董解元西厢记》时，将金时方言缀录于《蕙风歆簃随笔》中。他所校勘的《紫钗记》，能参互各本，证以《纳书楹谱》，做到“剖析异同，舍短用长，因文审曲，不以曲害文”。吴梅对《紫钗记》的校勘给予较高的评价：“《四梦》中《紫钗》最为难勘。……今楚园先生重刻此曲（荫按：即况氏所校本），全书体制一遵汲古、竹林两本，分配角色则从戚本，萃集众长，成此精刻。”可见他并非“颠倒串戏”。所谓“拗折嗓子”，出自汤显祖的一句激愤话：“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。”后用来讥讽度曲者不顾曲律的平仄，让演唱者拗折嗓子，况周颐只是校曲者，作曲事与他何干？当然“术业有专攻”，他并不是顾曲名家，况且校书如扫落叶，难免会有不足。1917年，刘世珩又请吴梅重新校订了《紫钗记》，他据柳浪馆本，复以诸本互校，着重依据《纳书楹谱》订正曲牌、词句，用《大成宫谱》分别正衬、格式。

清末将校讎学引向对词集的校勘整理，刘世珩也受到这种风气的熏染，他以“校经史例订杂剧传奇，可谓于此中别开生面者”^⑨。这话并不过分，他不仅将戏曲史上的古典名著，如《西厢记五剧》及附录、元明间五大南戏、《四声猿》、《临川四梦》、《粲花五种》、《梅邨乐府三种》、《长生殿》、《桃花扇》等哀为一编，而且还附刊了《录鬼簿》、《曲品》、《新传奇品》等重要的戏曲文献（尽管当时的本子欠佳，后来有天一阁散出的明抄本《录鬼簿》、乾隆杨志鸿抄本《曲品》等的发现，取代了它们）。所选传剧不仅选择善本，校勘考订，刊印精美，而且还继承了明清刻曲文图并茂的特点，对所选剧本大多都配有插图。因此，经过这么一番整理，使之更便于阅读或演唱。《汇刻传剧》的确是开近代以来编印校勘戏曲古籍之风气。刘世珩前后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，才使这套丛书编纂告竣，可谓历时久矣。先陆续以单种刊行，民国八年（1919）至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才将三十四种汇为一编，其中传剧《拜月亭》、《荆钗记》、《白兔记》、《金印合纵记》、《霞笺记》、《紫钗记》、《邯郸记》、《春灯记》、《燕子笺》、《西园记》、《情邮记》、《画中人》、《天马媒》、《桃花扇》等十四种；附刊《北词广正谱》、《南词新谱》、《新定十二律昆腔谱》等三种，总共十七种有目无书。就在这套尚未出齐的汇刻本印行后的第三年，即1926年，刘世珩便溘然辞世。直到1978年至1984年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才用刘氏原版予以补印，但仍缺失《金印合纵记》、《霞笺记》、《春灯记》、《燕子笺》及《北词广正谱》等三种曲谱^⑩。尽管如此，《汇刻传剧》仍不失为一部好的戏曲丛刊，受到研究者和读者的欢迎。刘世珩、吴梅等人厥功伟哉，而况周颐的贡献也不应埋没，故表而彰之。

《况周颐致刘世珩手札二十二通》除了提供他校勘《汇刻传剧》的情况外，还有几点也是值得我们重视：一是，他为了能进中华书局谋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在介绍自己的履历时说：“曾充江楚编译、官书局总纂、会典馆绘图处纂修。”（见第十八封信）（所谓“江楚编

译”，即江楚编译书局的编译）这前面两个职务，冯开《清故通议大夫三品衔浙江补用知府况君墓志铭》和孙维城《晚清词人况周颐简谱》均未涉及到^⑩，何时任职还有待考证。二是，他在沪上不仅卖文为生，而且还开过书店，既卖自己的藏书，也帮别人寄售。对“生意不佳，万分踯蹰”，徒唤“奈何！”（见第二十二封信）三是，况氏以词学名世，驰誉清季词坛，且分发浙江候补知府，并加三品衔，还未来得及正式任职，就已经改朝换代。蕙风为人踌躇满志，年轻时“目空一世”（王鹏运语）^⑪。然而，在辛亥革命的历史大变动中，他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，又面临着沉重的生活压力，不得不承认严峻的现实：“自维名誉、声气、威望、酬酢皆不如人。”（见第十九封信）前后对比，判若两人，显得别是一番凄凉落寞。为了谋取生活出路，他托人找工作，不惜降格以求，“除了外国文外，不拘何事均可担任”（见第十八封信）；为了得到一点润笔费，他甚至替朱象甫的如夫人写极香艳的墓志铭，“庶几圆姿替月，媚脸呈花，不得专美于前矣”（见第十一封信），不知愧煞反而自鸣得意，一代词人境遇如此，深可慨叹也！书信最能体现作者的个性，它可以毫不掩饰地吐露自己的真情实感，可为研究况周颐其人其词的学者提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附《况周颐致刘世珩手札二十二通》

一

《江东白苎》全部、《录鬼簿》全册、《昆腔正律》前四卷共一百七十六叶，均已校毕，祈 飭纪便中来取。《录鬼簿》新写本，著录曲名全然倒乱；原书次第，所有小注全行删去。又缺卷中“题识”、两家卷尾长跋一首，又将原书所无曲名、人名羈入，当是别据一本，此本未校。但各小注及题识、长跋总不应删削耳。此本讹字均已校出，即依此改正付雕亦可。又《荆钗记》上卷，曾经有人校过，稍近率略，经颐补校，约增十之八九，亮蒙 鉴及。此请

葱石先生台安

颐 敬上

《江东白苎》、《录鬼簿》即亦同新写本交回。

《出相琵琶记》抄本，《紫钗记》、《白兔记》、《秣陵春》各二本，《荆钗记》一本、《九宫大成》全部均已交回。又及。

二

《江东白苎跋》（“苎”字应否缺末笔，新刻未缺）拟就呈教，并复勘一过，有补校一处，并前校误改及未改共三处，均签贴样本书衣。祈鉴。余事容陆续速办。《邮情记》已商之来熏阁，渠即函询吴中，月梢回信。杜少陵赠斛斯六官句云：“本卖文为活，翻令室倒悬。荆扉深蔓草，土锉冷疎烟。”^⑬乃目前之贱状矣。欲求惠支十元，如可，祈伤人掷下。敬请

聚卿先生著安

周颐 顿首 十七有友求《陶集》一部，奉印资一元，在颐支销内核计。如可行，亦祈交下。

三（见图一）

《紫钗记》下卷九十二叶校毕，呈鉴。其上卷，前日交贵使带回，计查入矣。《牡丹亭》及《昆腔正律》如作跋，须晤教片刻，面聆意旨。先此布达，或于一二日内午后走诣所，为作跋事

紫钗记下卷九十二叶校毕呈
 鉴其上卷前日交贵使带回计
 查入矣牡丹亭及昆腔正律如作跋须晤
 教片刻面聆意旨先此布达或于一二日内午后走诣
 所作为作跋事也叩请
 吴书荫先生著安 周颐顿首 廿一日
 先聆 意旨刻作跋事 尊表免再改定
 别大人 叩 请
 上海大昌元製

（图一）

也。即请

葱石先生著安

周颐 顿首 二十一日

先聆意旨作成易合 尊意，免再改定。

刘大人 颐请。

四

榆教敬承。《紫钗跋》昨已脱稿，晡时当可呈政。馆事一说出，沅尹先生雅意^④，刻亦尚未允恰。贱状只缘此一线生机，务求代秘勿宣，庶几可望有成。劬恳千万关垂，纫佩无极。敬请聚卿先生著安

周颐顿首十五午刻

榆教敬悉。《紫钗记跋》昨已脱稿，甚长，即日录奉削政（旁注：晡时当可送到）。所云馆事一说出（旁注：关垂，纫佩无极），沅尹先生雅意，亦尚未允恰。目前贱状，只缘此一线生机，务求代秘勿宣，庶几可望有成。劬恳千万，此函专为此发。即颂聚卿先生著安

颐 顿首 十五午刻

五

代校《大戴礼记》十四叶

《秣陵春》全部一百七十七叶

又 六十二叶

《牡丹亭》全部一百十三叶

《荆钗记》六十八叶

《琵琶记》眉批全部作为十六叶

《绿牡丹》上五十叶

已上共校书五百叶，每叶拟领润洋二分，前蒙惠赐十元，拟以已上校件报销，伏候 鉴核，余书仍在陆续校上。颐再劬

六

《会真杂录》上卷一百四叶，已校毕，午后送道达里公馆。汪刻《西厢记》前，有明杨升庵黄夫人《题双文小像》七古一首，极佳。黄夫人诗不多作，向止流传《寄夫》一律，此诗诚天

鹿吉光，而《杂录》未载，亟应补入者也。又《枣林杂俎》有黄夫人传略，亦可缀录。又本朝人来鸿璫有“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，辜负了雪窗萤火十余年。《西厢》第一折张生语”题制艺，甚佳，似亦可收入。又颐所藏《宫闺百咏》绝精刻本，有《双文待月试帖》五言八均（韵）三首，皆名作，亦可收否？有制艺何妨有试帖耶！

聚卿先生

颐顿首 十五日

七

《会真杂录》下卷卅叶，又《传奇序》、《西厢目》共十七叶，均校毕。奉上《杂录》底稿，不在一处，旋检旋校，极费力费时。陈眉公《西厢音释》、顾玄纬《会真杂录》及《西厢考据题释》，交去写样，必有底本，未蒙交下。各底本祈即交下，否则无从校也。《紫钗》、《邯郸》两跋如何作法，祈书节略各一，示下，即可属稿。《〈西厢〉题制艺》呈鉴，《试帖》容写呈。唯皆是道咸间人作，细思之，恐于尊辑体例未称耳。尚有明人笔记一则关系《会真》；又《调笑令》尚有考据，统容今夕写呈。尊先集已勘订二十叶^⑤，是否如此办法？盼示遵，并各底本、两跋节略，均立盼。葱石先生

颐顿首 十六

候示，祈速，以便接办。

八

《传奇目》即按照次第更定，顺序者，昨同《西厢》王伯良本，交贵纪手回。兹又交回《西厢总目》一册。又《琵琶记》一套四本尚未说价，暂作借看，容俟与议。又《西厢记》一部六本价六元，亦如文，甚佳，字模稍粘，可采□审定也。三种共十一本，祈查收。王伯良本《西厢记·凡例》就此一本即可，祈再假下一看其中尚别有可采处。便中祈飭纪带下，三日内奉还。待孙裕写，未卜何日也。至劬至盼。二

十元奉到，谢谢。

楚园先生

颐 顿首 即午

《西厢记》有升庵夫人《题双文像》诗，亦至佳，闵振声是否遇五？祈示。

九

《西厢》徐本，因欲留校《钱塘梦》，故未交回，兹并《传奇总目》敬缴。王伯良本“凡例”中考论“齣”、“齣”字一则，千祈逡写掷下（旁注：千万千万，切盼切盼，等用），拟入笔记，字无多也。余容邮函详述，传奇提要，亦拟十日内报命。能再假二十元否？（旁注：前二十元已付催租也）冒渎勿为罪也。匆布，即颂

楚园先生夕安

颐 顿首 即刻

校曲仍每叶二分，但能救急为佳耳，呵呵。

十

顷又有邮片寄上，问王实甫《芙蓉亭》剧演张崔事，而《曲目》云《韩彩云丝竹芙蓉亭》，何也？又《钱塘梦》，查出系元人白朴作（详邮片）邮片误书“璞”。目云《苏小小夜月钱塘梦》，未知尊处所刻即此剧否？又《四声猿》之“求皇得凤”，欲摘用其中字眼，如能交下更佳。匆复

葱石先生

颐 顿首 即午

十一

《荆钗记》之两“介”字，再细思之，以仍之为是。上“介”字是递书与吏关目，下“介”字是递书与钱关目。或于书眉加一批云：“两‘介’字并应作‘递书介’，不言递书，省文耳。”恐曲本科白中，它处亦有如此令人意会者，故以不改，批出为宜。

朱象甫之如夫人埋香所在，及其年月日，挽联之佳者，务

求转致，见示为幸。象甫住淮河路，门牌是第几号？祈示知，恐或有情节询问，须与通信也。墓志之作在前途（？疑误），为应有之义。刻石后，可拓若干本，同《忆语》送人，亦彤管贻美之一法。而鰕生亦得霑濡润，当为昉小唐碑作极香艳文字，庶几圆姿替月，媚脸呈花，不得专美于前矣。

商务印书馆馆地（址），於菊翁枉顾后就之^⑥，已支两月薪水矣。顷所面恳先生，以为可言则言之，如以为未便，即亦不敢勉强。倘荷鼎言之力，得以如愿而偿（本每月四十元，欲得加二十元、三十元更妙），则伏案光阴，稍稍宽裕。

先生委办之事，当必精益求精，速而又速也。象甫处孔方愈速愈妙。敬请
葱石先生著安

周颐 顿首 即夕

十二

传奇序三首，浣诵均訖，闲以拙见赞订，似乎斟酌尽善。究未审有当否？仍希卓裁为盼。增补骈体序，当于十日内报命。月垂稍矣，催租昀届，拟恳惠段舒鳧三十翼，可否？盼复。此上枕雷先生

周颐 顿首 二十九日

十三

《刘语石词题词》已拟就，唯无真确交情可说，又无多意谊，殊无从求工。敬祈改削，尚未卜可用否矣。便中祈饬人来取为荷。

葱石先生

颐 顿首 九月二十三日

十四

昨奉教，至快慰。先德诗文集请即交下，《说文（解）字》陆续旁注，先生陆续誊写，不致误事。《会真杂录》等易斟，必速；

书目前引，亦即代撰。日来催租期届，正在咏“满城风雨近重阳”也。此颂

葱石先生著安

周颐 顿首 十月二十九日

十五

支款逾分，歉仄之至。今日勉强能在床起坐，将未校毕之《传灯录》一册校毕，此书三函，已毕一函。便中飭人来寓取去。此上

葱石先生

周颐卧书 十八日

再能稍久坐即校《桃花扇》

十六（见图二）

《南柯记》全部及《桃花扇》均已校毕，便中祈 飭人来去。《桃花扇》校刻绝精，可为《汇刻传奇》之冠。此次更精校，校出元误，有至佳至快处。唯所欠之叶，送样内欠数叶，必须送校，凡加朱之处，必须照改，勿讹勿漏。如能悉依朱笔，则虽一〇一亦无舛误。改后必须打小样送看，庶几完善。颐处本月半后，因家事多一用项，现值月梢，将届催租甚急，昨托孙纪转稟，再支二十元，祈即惠下，至盼。前支之数，已将可报销及半矣，余事当陆续速办。有觊面目，必不

南柯记全部及桃花扇均已校毕
为彙刻传奇之冠
此次更精校出元
送校凡加朱之处必须照改勿讹勿漏
打小样送看庶几完善
值月梢将届催租甚急
惠下至盼前支之数已将可报销及半矣
有觊面目必不荒唐
葱石先生道安 即有
信 燈录校毕七卷
已示知手 又及

（图二）

荒唐，昧罪娄(屡)瀆，良非得已，尚祈諒之。匆布，即頌
葱石先生道安

頤 頓首 二十四

《传灯录》校毕七卷，已交孙手。 又及。

十七

石渠五种五段之前，有“昔闻石渠制曲”至“杂组總其艳华”十句总冒，此十句与“四梦”之“粤若曲圣”至“选玉茗之‘四梦’”四句，“四声”之“至若白衣秀才”至“麟非一角”四句，章法政同，其它各分各段者，无此总冒也。既有此总冒则五段仍是一段，不过稍长耳。《春秋》与群经中最重例，然亦有变例，有通例，此通例之说也。章法，凡一人之作均合并一段，独至石渠五种，忽然才思横溢，有此五段之发拗，而仍不失合并一段之章法，是政文情奇恣不可测处。所谓错综规矩之外，神明规矩之中，此等处史公、昌黎有之，即近人桐城派中，亦间或一见，古文作法固可通于骈文，宁非古特句俚耳？即谓石渠五种，向来难致，特附通例以宠异之，亦无不可。总而言(之)，但与各分各段者有所不同，即与章法无害也。果真不合章法，頤亦岂肯自己出名，冒昧付梓。即性不好名，亦不如是其甚也。因尊示有云，否则须分五段，頤故勉为其难，所谓遣将不如激将也。一笑。若合并一段，事极易之，可节省若干晷刻，亦何乐而不为耶(旁注：頤凡办事不愁费思索，只愁费光阴耳)！自余悉依元目，无复可议。

楚园先生

頤 頓首 十一日夕

十八

昨晤教，至佩，委件均可办。陆费(逵)伯鸿处^⑦，务求嘘植，以速为妙。凡所延订，均在新历正初也。并请告知，即商务书局(旁注：月五十元)之《蕙风》贱姓名亦请告知，《东方杂志》及《小说月报》皆有成绩或頤所刻各书送去一部亦可；又曾编印《说部撷华》。曾

充江楚编译、官书局总纂、会典馆绘图处纂修。除外国文外，不拘何事均可担任，云云。此恳敬请
葱石先生著安

周颐 顿首

十九

昨送呈《传奇序》及《金石文》一册，计蒙鉴及今日来榭，未蒙提及。刘厚生处已荷赐函否？《金石文》如能销售，则度岁之资，可无须奔走筹策（旁注：连日奔走不遑也）。它处笔墨事件，亦可概从搁置，则年内所能报命者，容不止传奇提要而已。此事盼望回音，至切也。《紫钗记跋》拟今夕属稿，入二十元之报销，其前支八十元之数，年内亦必呈一清单核计，尚欠若干，以为结束，决不缘此区区之数，而致荒唐。唯贱状无一长局之事，似此零沽叫卖，何以为怀。自维名誉、声气、位望、酬酢皆不如人，亦无可如何。所以陆费（逵）处事，亦至为切盼也。

聚卿先生

颐 顿首 初十

《南词新谱》呈缴。 陆费（逵）处、《金石文》两事，均盼示复。千万千万！

二十

骈序遵示改定无讹，石渠五种分为五段，此序越改越长，又竭一日之力矣。《西厢记》留用与否？祈 示知。如留用，书价由颐代付亦可，因系掇客携来，不能久阁。西园本《桃花扇》，亦该客携来，当时未经留下，当嘱其再送来，渠约三天来取信也。《琵琶》即日人之物，系借来看，未说价也。此颂
楚园先生著安

颐 顿首 六月十一日

二十一

《昆腔谱跋》呈上，昆腔源流尚说得明白贯穿，伏候鉴定。

今夕作《牡丹亭跋》。前支之款便可报销完毕，容并櫛呈。昨呈三件，櫛示碑存，而贵纪又交下，属带回，未卜当否？欲求于碑直外，多支卅元，作为开岁办事笔资。如何办法，敬当遵示办理，或仍盼今年报销亦可。二十七矣，事急矣！共五十元，愈速愈感。日前得韩履卿崇《珍宝斋诗》，有句云：“穷士易为恩，寸苗易为泽。”又云：“识曲诚有人，雅歌奏清瑟。”则鰕生所仰望于贤达者也。

葱石先生执事

周颐 顿首 二十七夕

二十二

櫛教敬悉，颐尚未痊愈，仅能吃饭小半碗，精神疲敝异常。西山碑一张，常州词一部，英洋拾元，遵呈祈收。生意不佳，万分竭蹶，奈何！《竹垞小志》、《北湖小志》等书，从前均系借看，张午桥先生所藏，自己并无是书。《夕阳邨诗》不但无之，并且向未见过。此次因开书店，于各书箱中检书取售，无一不翻腾纷乱。书箱逾百，自己亦不记某书现在某箱也。佳胜佳故，容检出呈奉。敬请

健安

后学周颐叩复

云郎事见《茶余客话》。前云《唐荆川集》可以寄售，未蒙交下。又及。

附录：瓠庐附识^⑮

词、曲韵律迥然不同，词人度曲，未必不见笑于大方之家。何况金源蒙人各有代语，朔望南天，亦异方言，度曲者不之知，鉤輶格磔，犹貽笑柄；校曲者更何能不知而作耶！黄九烟《制曲枝语》谓：“三侧更须分上去，两平还要辨阴阳。”实则由《中原音韵》以□《中州全韵》，剖析豪茫，精益求精。奚止九烟

所云，惟律亦然。校曲者倘不据沈词隐、李玄玉诸家南北宫谱，以分别考索，更乌知其为讹为正。所谓以经证经、以史证史、以子证子者，最得校雠考证之道，则亦曰以韵校韵、以律校律耳。惟词韵非曲韵，词律非曲律，否则差若毫厘，谬以千里矣。况公为清季词人之杰出者，向使追随半塘、四印、疆邨一编^①，而参与校词，则成业何可限量。乃从事校曲，遂至颠倒串戏，折拗嗓子，我人姑卑之无高论。以《九宫大成》订律，以《韵学骊珠》订韵，燃犀悬镜，已能立发其覆。况乎金元代语，须据华夷译语、南朔方言，须证他曲成文，更等而上之，涉及助词语法耶！虽然其犹贤于金，采之妄改旧文，毛大可错释助词也。且必一画之成，十日一山，五日一石，能事固不受敦迫也。乃修笔之薄，则二分明月，一叶秋风，而谓娇儿啼哭饭箩空者，能吮墨含毫消磨岁月乎！则暖红室主亦不能辞其咎矣。甲午季夏瓠庐跋于海上寓公谷之流碧精舍。时宿雨不晴，阴阴润绿，浓湿扑人，予怀悒悒，回忆三十年前，与况公交契，不无怅怅。特以不忍负死友故，自托于诤言之末，非感为逢蒙杀羿也。意有不尽，辄作附识。

注：

①《皖志列传稿》卷八《刘世珩传》。史料采自江慕洵所撰《行状》、李详《四十寿序》等。

②见袁行云《清乾隆间扬州官修戏曲考》，《戏曲研究》第二十八辑，1988年。

③见蔡仪编《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》二。

④《绥中吴氏抄本稿本戏曲丛刊》，由首都图书馆编辑，学苑出版社出版，2004年5月。第四十八册为《暖红室校刻传剧资料丛辑》。

⑤赵尊岳：《蕙风词岳》，转引自孙维城《晚清词人况周颐简谱》，《安徽师大学报》第20卷（1992年）第一期。

⑥见《蕙风词话》卷一。

⑦见《汇刻传剧》卷首。

⑧见《荟风篠词》未刊稿。

⑨刘世珩:《汇刻传剧自序》。

⑩阳海清编撰的《丛书综录补正》认为:“拜月亭、荆钗记、金印合纵记、霞笺记与南词新谱五种从未见书,亦无版片,似系原缺;春灯谜、燕子笺、画中人、北词广正谱四者仅见封面一叶,正文当未付梓。”此话不完全恰当,像《金印合纵记》、《霞笺记》、《画中人》三种,傅惜华《明代传奇全目》所著录之刊本中,就有暖红室《汇刻传奇》所收本;郑振铎《春灯谜跋》云:“阮氏之《燕子》、《春谜》,余于暖红室及董氏所刊者外,尝得明末附图数种,均甚佳,惟惜皆后印者。”可见暖红室也刊印过《燕子笺》、《春灯谜》,至少以上这几种绝不是原缺,都曾付梓刊行,今仍有存本可查。《荆钗记》不止一人校勘过,也存有单行本。

⑪冯开所撰《墓志铭》,见寒冬虹《新见况周颐墓志铭拓本》,《文献》1994年第1辑;孙谱见《安徽师大学报》1992年第一期。

⑫见《彊村词剩》卷首。

⑬按:此诗为杜甫《闻斛斯六官未归》诗的中间两联,全诗为:“故人南郡去,去索作碑钱。本为卖文活,翻令室倒悬。荆扉休无赖,归来省醉眠。”(见《九家集杜诗》卷二十二)。

⑭沅尹:朱祖谋之号,又号彊村,清季四大词人之一。

⑮尊先集,即刘世珩父亲刘瑞芬的《养云山庄文集一卷续集一卷诗集四卷》。

⑯菊翁:疑指菊生,即张元济(1867—1959)字筱斋,号菊生,浙江海盐人。1914年夏,任商务印书馆经理。

⑰陆费逵(1886—1941),字伯鸿,浙江桐乡人。1912年,与沈知方等在上海创立中华书局,任经理。

⑱瓠庐:不详。如有知此人,敬请告知。

⑲半塘、四印:皆为王鹏运之号,清季词四大词人之一。

作者工作单位:中国语言文化大学